



宋韵辽风

宋辽金
易县大北

走进11展厅,看到的第一件文物是一口绿釉陶瓮,瓮高45厘米,口径25.3厘米,底径14.5厘米。为什么金银器展中看到的第一件文物是陶器?展览策展人、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杜永梅介绍,1986年,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县城东10公里的高陌乡大北城村曹姓村民在农田劳作时发现了这只陶瓮,从中发现了四百余件金、银、琥珀、玉、水晶等器物,不管是数量、品类、质地、纹样都十分罕见。“这次的发现属于窖藏,考古学中把因为战乱等原因,放入容器内并匆忙埋藏的文物称为窖藏。除了文物,考古人员没有发现文字资料,无法确定这批珍贵的金银器所属何人,但肯定是地位显赫的人,而且这些器物都是其所有者生前使用的物品,而非冥器。”陶瓮身后,一幅《丹枫呦鹿图》制成的背板映入眼帘,据记载,《丹枫呦鹿图》应为辽代画家绘制于北宋初年。整幅画作描绘了群鹿漫步于深秋树林中的场景,时值深秋,树林中的叶子部分略微变黄,有的已经深红似火。杜永梅介绍,《丹枫呦鹿图》是当时辽代地区自然风光的真实写照,而且这幅画作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辽兴宗进献给宋朝的,也说明了当时宋辽两国在文化等领域存在频繁交流的现象。

河北易县,因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被人们熟知,但在宋辽并立期间,这里也是双方经济、文化的交融之地。杜永梅带记者来到一张元代的契丹地理图前,可以看出当时的易县,以及周边的蓟(今天津市)、燕京(今北京市)均地处宋辽两国交界。杜永梅说,《澶渊之盟》让宋辽两国维持了118年的和平,其间两国不仅互派派遣使者,而且边境地带的交往也十分密切。“宋辽会在边境地区设置多处榷场,这是货物交易的地方。可以看出,即便是宋辽对峙时期,两国的文化交流不仅没有断绝,相反非常频繁。”

了解了上述基础,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展品背后的文化。说到金银器,自然



展览的第二部分酒器单元中,注碗、盘盂、酒盏等,尽显辽地特色,“首饰蕴宋韵,酒器显辽风”可以说是宋辽文化交流最直接的物证。酒器,用宋人的话说可以称作“饌器”,亦即筵席用器。宋代时期,金银酒器已普遍用于各类酒器的制备,而辽代更多为豪门贵族所用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套银执壶与温碗组成的温酒器具。执壶长颈、折肩,盖钮做成一个二重台,顶端盖钮上方的小狮子造型灵动,下方与壶柄相连,表面细腻的纹饰着连珠纹、龙牙蕙草。因其外形与内蒙古多伦小方沟萧贵妃墓出土的银钹青瓷注子相同,可以感受到明显的辽代风格。银温碗是花口设计,口沿、圈足用鎏金技艺篆刻龙牙蕙草,与同出的银盏、银执壶形制呼应,这些花纹部分鎏金的器物,又被称作“金花银器”。酒器单元的最后,是一面摆满八十五件银碟的展柜,这些银碟均为花口素面平底,底部刻有铭文,顺序皆为计重在先记名为后。这些银碟历经数百年岁月,如今在灯光的映照下依旧熠熠生辉,底部的铭文也依然清晰可辨。

货币单元中,一批大北城窖藏出土的银铤、金叶亮相,其上刻铭、墨书承载的财富价值与历史信息意义重大。银铤共18块,均为50两官铤,其中一件银铤上的铭文虽斑驳,却依稀能辨认出“进奉夏祭银”等字样,这是第一次证实了文献记载中的宋代夏祭制度。银铤铭文最晚年代为北宋末年,为研究北宋晚期货币体系提供了大量实物标本。

细心的观众发现,进出展厅时脚下的地面印着金色的“脚印”,它们的原型便是货币单元中的金叶。这些金叶子上写有“税讫”二字,即已经纳税,成为可以流通的商品。杜永梅介绍,在史书记载中,当大钱或铜钱贬值时,会有许多人兑换金叶以求保值。

古代的男人有多爱美?那就不得不提到本次展出由髹(音同秋)尾、带鈎、带箍、腰带扣组成的带具单元了。带具单元所展出的一组精美的鎏金银质束带组件,鎏金银髹尾与



本次展览展出的240余件(套)文物都出自展览入口处的绿釉陶瓮,杜永梅将这些文物分成了首饰、酒具、带扣、货币等类别,而在展览的最后她还单独列了一个杂项。“杂项中的文物尚不明白用途,有的只能靠猜测,但是这些文物无一例外都十分精美。”杜永梅说。

其中一个展柜中摆放着一顶镂空五佛金冠,这是杂项中体积最小的文物,参观者需要利用展柜中安装的放大镜才能欣赏文物的各处细节。金冠顶部有五个波曲,且均由中间向两侧渐降。金冠正中间是一尊带火焰背光的莲花坐佛,两边各有两尊相同佛像分列上下。该文物留白处刻有镂空制作的卷草流云,而在冠口两侧,各缀有一朵银质流云及其他挂饰。杜永梅介绍,这件文物可能是佛像或是菩萨像的头冠。

一旁摆放的金覆孟形器的用途也在研究之中。只见三道连珠纹将器身图案隔出三层;顶部为蟠龙隐起,戏珠于云间;中间是一圈缠枝牡丹;底部为一圈龙牙蕙草,器物的空白处篆刻鱼子纹。类似这样的文物还有很多,每一件都刻满了花纹,有的文物两侧留有穿孔孔应该是作为饰品使用。杜永梅介绍,虽然这些文物的真正用途尚不明确,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展示了



首饰中看宋韵辽风

离不开首饰,本次展览中首饰也占了大部分。展柜中的满池娇纹金梳十分精美,所谓“满池娇”指的是宋代的绘画、工艺品的题材,它描述了池塘中的风景,常见造型有荷叶、鸳鸯等。而眼前这把金梳的梳背上打满了满池娇三重图案,正中的梳脊上刻有鱼子纹地上缠枝莲纹,以及童子化生等形象;上下两侧梳背的图案依旧是鱼子纹地上缠枝莲纹,同时刻有鸳鸯、慈姑叶等纹样。杜永梅说:“‘满池娇’作为宋代的特色出现在辽代的文物上,进一步说明了当时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;同时辽代工匠还在‘满池娇’基础上,加上了辽代独有的‘春水’纹样,让这件金梳成为宋辽文化交融的见证。”除了欣赏梳背上的“满池娇”,您别忘了看看梳背与梳齿连接处的纹饰,杜永梅说该文物的梳背和梳齿极有可能是分别制造后拼接而成。“这些纹路是工匠拼接时留下的敲击纹,但现在已成为器物上很好的装饰,说明当时制作加工金银器的手工艺已经十分成熟。”

继续向展厅深处走会发现,辽代不仅与同时期的宋朝存在文化交流和互鉴,还会学习唐朝的文化。展柜里摆放着六对耳环,其中一对金穿玉摩羯戏珠耳环更是精品。摩羯指印度神话中的巨型海兽,形象融合了鳄鱼、大象、孔雀等特征,在佛教中象征强大的力量。而摩羯纹自印度传入中国后,逐渐演化成龙首鱼身或带翼造型,象征驱邪护法。而眼前的这对金穿玉摩羯戏珠耳环,制作者使用玉石制作出摩羯形象,十分精致。杜永梅介绍,内蒙古、辽宁等多地均考古发现辽代摩羯纹耳环,说明辽人是十分崇拜唐朝文化的。

古代男子也爱美

十八件方形、桃形鎏金银带鈎集精湛工艺与时代审美为一体。其中方形鎏金银带鈎上雕刻的菩萨姿态各异,却排列规整有序,恰似仪仗队伍行进;其周围环绕着灵芝云以及犀角、象牙、金锭、银铤、宝珠、古禄钱等杂宝。鎏金银腰带扣上篆刻了一朵弯折的牡丹,在与扣针相对的侧边,镌有一溜龙牙蕙草,周边则装饰着毯路纹。扣舌所抵的外侧长边框,两边皆饰有毯路纹,两侧短边框则篆刻着牡丹瓣纹。

杜永梅介绍,先秦以来的中国古代腰带,主要有丝织物制成的大带和皮革制成的革带两种。革带除束腰外,更重要的用途是系挂佩件。需要借助带钩、带扣辅助系合,还需在带身上安装若干称为鈎的构件方便佩挂。髹尾是带具的收尾构件,用以保护革带末端,同时兼具美化带具整体的作用。因初唐以后,髹尾均向下顺插,所以图案多成垂坠之形。宋辽革带以不同的材质、样式、装饰展示其工艺与审美,以其多种材质的叠加和繁复的制作工序来加大制造成本,附加审美元素,因而承担了实用之外的更多功能和意义,成为身份、地位的象征,在交往中得到宋辽双方的青睐。

有些文物依旧神秘

当时工匠高超的水平,以及当时文化的繁荣。

通过上述文物可以发现,宋辽两国并立时,民族交往一直在进行,文化交流从来没有断绝。榷场中往来的商旅、两国交聘的使臣都成为这一时期的亲历者。宋人张芸叟曾奉命出使辽国,夜宿幽州馆驿,亲眼见到辽人将苏轼的《老人行》一诗题写在墙壁上。当时的范阳书肆还刻印有苏轼的诗作数十篇,称之为《大苏记》。可见苏轼的诗情才气,同样为幽州地区的辽人所看重,就像当时的一句谚语所讲:“谁传佳句到幽都?逢着胡儿问大苏。”

副中心探宝之宋辽金器

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戢

满池娇纹金梳、摩羯纹耳环、全套的银质温酒器具、精致的镂空五佛金冠……这些兼具宋辽两朝风韵的金银器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,为观众展现出千年前两个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凝结。《宋韵辽风——易县大北城窖藏金银器展》目前已在博物馆主楼三层二展厅开展,也是这里成为京津冀博物馆展厅后的又一重磅展览,汇集金银器物170余件(套),生动呈现出宋辽并立时期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画卷。